

分类号: C93
密 级: 公开

学校代码: 10363
学 号: 2211120104



安徽工程大学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题 目 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
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论 文 作 者	<u>常勤珊</u>
校 内 导 师	<u>刘 军</u>
校 外 导 师	<u>杨少华</u>
专业学位类别	<u>公共管理</u>
研究方向（领域）	<u>公共政策</u>

论文提交日期: 2024 年 5 月 28 日

分类号: C93
密 级: 公开

单位代码: 10363
学 号: 2211120104

题 目 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英文并列

题 目 **RESEARCH ON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F WUHU CITY**

学生姓名:	常勤珊
校内导师:	刘 军
校外导师:	杨少华
专 业:	公共管理
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
论文答辩日期:	2024年5月25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常勤珊

日期：2024年 5 月 28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工程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 __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常勤珊

指导教师签名：2/3

日期：2024年 5 月 28 日

日期：2024年 5 月 28 日

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研究

——以芜湖市为例

摘 要

社区组织与居民共治是社区管理的发展趋势，而居民的高度参与是“共治”的重要前提和手段。深入分析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的动机、行为和影响因素，不仅深化了对社区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组织发展的理论认识，而且为相关学科的理论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因此，如何促进城市居民积极有效地参与社区组织，是社区治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

本文结合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理论模型。以社区组织案例较为丰富的芜湖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研究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意向受到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态度”、所受到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正向影响。而社会资本和社会交换除了对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态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外，还分别通过影响其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来影响其参与行为意向。为此，本文分别从居民、社区组织和政府三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进一步提升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的积极性。

关键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影响因素

Research on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f Wuhu City

ABSTRACT

Co-governance betwee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residents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a high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and means of "co-governance".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 behavio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not only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and perspectives fo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disciplines. Therefore, how to promote the active and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s a field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research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exchange and planned behavior,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urban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aking Wuhu City, which has abundant case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data were obtain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verify and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urban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behavioral attitude" of urban residents towards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In addition to influencing the behavioral attitudes of urban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exchange also affect their participation intentions by influencing their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enhance the enthusiasm of urban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hang Qinshan (MPA)

Supervised by Liu Jun

KEY WORDS: Urban Residents;Community Organizations;Participation Behavior;Influencing Factors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9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9
1.1.1 研究背景	9
1.1.2 研究意义	10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1.2.1 关于社区组织研究	11
1.2.2 关于社区参与研究	13
1.2.3 关于参与行为研究	14
1.2.4 国内外研究评述	16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7
1.3.1 研究内容	17
1.3.2 研究方法	19
第 2 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依据	20
2.1 相关概念	20
2.1.1 城市居民	20
2.1.2 社区组织	20
2.1.3 参与行为	21
2.2 理论依据	21
2.2.1 社会资本理论	21
2.2.2 社会交换理论	22
2.2.3 计划行为理论	23
第 3 章 研究设计和实施	24
3.1 研究模型及假设	24
3.2 研究变量测量	26
3.2.1 计划行为理论维度	26
3.2.2 社会交换理论维度	27
3.2.3 社会资本理论维度	28
3.3 芜湖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现状	29
3.4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30
3.4.1 问卷设计	30

3.4.2 数据收集	30
3.5 问卷信效度检验	31
3.5.1 信度分析	31
3.5.2 效度分析	32
3.6 样本特征分析	34
第 4 章 模型检验与假设验证	36
4.1 数据的描述分析	36
4.2 实证分析过程	37
4.2.1 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37
4.3 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假设验证	39
4.4 研究结果分析	40
4.4.1 整体框架路径分析	40
4.4.2 影响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行为的核心因素	40
4.4.3 社会交换与主观规范之间的相关性	41
4.4.4 社会资本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的相关性	42
第 5 章 提升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主要对策	43
5.1 巩固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的主体地位	43
5.1.1 提高居民参与意识	43
5.1.2 完善社区组织制度	43
5.2 社区组织各显其能激发居民参与	44
5.2.1 发挥物业组织环境脉络优势	44
5.2.2 发挥自组织的深度影响优势	45
5.2.3 社区组织协力合作各显其能	46
5.3 政府引导下的社区组织合作新格局	46
5.3.1 帮助引导社区组织之间合作	47
5.3.2 指导完善社区组织合作制度	47
结论	49
参考文献	50
附录	55
附录 1 调查问卷	55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60
致谢	61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市场化深入,“非单位户籍”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高歌猛进,社会转型冲击了原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大量社会事务向基层社会挤压,国家为应对不断涌现且种类繁多的社会事务,先后进行了两轮社区治理改革。

第一轮城市社区治理改革(1995 年起)以“街居制”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施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治理体制。在“街居制”治理模式内,国家控制全社会的所有资源,独立承担整个社会的服务功能与发展责任,非政府组织、志愿组织或居民社会组织根本不具备孕育发展的条件,而社区管理任务的庞杂问题也依然积压在街道办事处,并且还将繁杂的行政事务“转移”给社区居委会,使居委会无法摆脱行政化的“顽疾”,导致社区自治空间被压缩。因此,在第二轮社区治理改革(2000 年起)中,政府力图破解社区工作行政化、基层工作繁重的难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要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再到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协调利益并保障权益的重要通道。可见,政府已将城市居民和社区组织作为社区的主角来共同参与社区治理^[1],对社会治理的目标、社会自治主体的要求和社会治理路径也更加明确、具体和清晰。

第二轮社区治理改革在中央层面的政策指引和各级政府“自上而下”主导中,穿插着“自下而上”的居民与社区组织的参与。这种治理模式打破了原有社区管理中单一主体的管理方式,与原先将城市居民排斥在外,政府“自上而下”仅以技术层面单向的对社区进行改造与完善的社区治理模式要科学和先进的多。第二轮社区治理改革不仅强调了居民的主体作用,使居民在合作进行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主人翁意识”,视“参与”为一种有价值的事情,还打通了政府、市场与社区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从而向真正的社区合作共治迈进。不过相对于看得见的现实效果而言,推动社区共建共治的社会基础还依然薄弱。就社会基层治理主体的城市居民而言,虽然居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但却常以缺乏有效约束机制和集体意识的分散化和个体化的方式进行参与,居民参与普遍缺乏公共领域的责任意识和参与热情。因此,居民往往在公共领域(提出个人诉求)和私人领

域（个人诉求满足后）中来回穿梭，致使居民的“公共性”无法被激发或持续，从而形成恶性循环^[2]。

社区组织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先锋，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承载者，又是社区治理中重要的公共服务主体和供给主体^[3]。促进城市居民的高度参与，可以大大强化居民的自我管理和组织化程度，同时还为居民和政府之间搭建了有效互动的沟通平台。而通过深入分析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动机、行为和影响因素，可以深化对社区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组织发展的理论认识，为相关学科的理论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因此，如何促进居民积极有效地参与社区组织，不仅是社区组织发展壮大首要条件，也是使社区持续优化发展的重要方式。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从城市居民和社区组织的紧密关系出发，结合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的行动因素，从而为共治共享的城市基层治理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

②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芜湖市处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相较于沿海发达城市和西部落后城市，是中国城镇化基础最好的城市之一，具有丰富的社区组织管理案例。因此，选择芜湖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代表性。

③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既往研究仅在探讨社区治理或社区组织发展等相关研究中提及了居民组织化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建议与对策，但是缺乏定量研究，本文对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2）实践意义

①本文从芜湖市城区的五区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若干社区，从居民、组织、政府三个层面全景式概览，深入分析影响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的因素，为芜湖市政府等相关部门对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决策依据。

② 本文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作为影响公民参与行为意图的关键前置因素并划分不同测量维度，最后分析这些维度对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影响差异，这进一步为研究社区治理与社区组织发展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关于社区组织研究

1.2.1.1 社区组织的理论研究

国外的社区组织的出现是为了改善和解决由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一些社区问题。为此，帕金斯（Perkins）等学者运用社会生态学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探讨了社区组织是如何通过社会参与和改善环境来影响社会和个人的行为^[4]。随着社区组织在改善社会问题所发挥的显著作用，19 世纪初，迈克尔·沃尔科克（Michael Woolcock）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网络、信任和互助方面开始研究社区组织的自我形成和发展^[5]，而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则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来研究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依赖于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获取^[6]。以上理论都为理解社区组织的运作机制、影响因素和社会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国内社区组织诞生于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浪潮中，发展历程较短，在探索适合我国政体的社区组织发展方式中，其组织类型一直处于相对失衡的状态，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也比较低^[7]。因此，国内学者们在关于社区组织的理论研究上主要基于对社区组织的服务对象、目标和功能的一致性，从社区组织的功能理论进行延伸。即，在社区组织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内，依据其整合性、服务性和支持性在社会功能的框架内来探究如何使社区组织充分发挥其政治参与、协调社会关系或对居民精神与心理上的支持等基层治理作用。如刘伟红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去分析社区组织的功能演化，认为社区组织的行为策略的发展轨迹具有调整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的作用^[8]。李杰从马斯洛需求理论出发，认为社区组织与政府是合作伙伴关系，社区组织以“顾客导向”的方式来向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不仅可以满足居民公共服务的需求，还可以满足居民个性化服务需求^[9]。

1.2.1.2 社区组织的经验研究

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使当时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社区组织的出现成为了当时的西方社会的一剂强心剂，为混乱的局面打开了一丝曙光。如 1884 年一种新兴的慈善机构——汤恩比馆（Toynbee Hall）的出现就是为了改善社区内贫困人群极端的生活困境，并通过社区服务和社会活动来培养社区的自助和互助精神，以此促进全面的社会福利。同样，1889 年美国芝加哥赫尔馆（Hull House）的出现也是通过为社区提供各种服务和资源，以改善贫困社区的生活条件，增强社区凝聚力和自治能力，来帮助当地的移民、工人家庭和贫困

妇女。由于西方国家强调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因此，政府与社区组织以合作伙伴方式协调发展，独立于政府^[10]。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西方社区组织的发展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并且成为低收入和被边缘化的社区来动员居民改变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资源分配结构性不平等的依靠。如约翰·T·德森西（John T. DeSensi）指出社区组织在跨国移民社区的社会融入问题中扮演了“差异的接受、适应及整合”的角色^[11]。克劳迪娅·拉德尔（Claudia Radel）在关注到墨西哥南部妇女由于受到社区组织的帮助而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土地控制权时，分析了妇女如何通过参与社区组织来影响土地控制和管理的情况^[12]。

国内的社区组织经验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社区的建设和管理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于是，政府开始探索建立社区组织和居民自治的机制，以促进社区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由于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统筹和协调作用，因此，在探讨国内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模式和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作用时，学者们首先便要确定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们提出了多种理想型关系格局。如王磊和周沛等学者认为，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可以形成相互信任、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伙伴关系治理”模式^[13]。也有一些学者对社区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秉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基于当前中国国情下构建政府作为“元治理者”的主导者与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过于理想，因此从“嵌入式”观点来探讨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如，管兵认为在制度与参与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使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更加清晰，从而实现基层社区真正的自治^[14]。易艳阳则试图从“科层”“地理”“文化”“服务”“对象”这五个“场域嵌入”来重塑社区组织助残“嵌入”发展路径，以实现残疾人真正的专业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的服务^[15]。其次，国内学者们对社区组织开展了多角度研究，如在探讨社区组织如何解决社区问题，以及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中。章军杰基于共同体视角中在社区专业者介入下再造社区组织，构成发达农村社区再造系统方法论，以此作为发达农村社区再造的一种探索^[16]。刘帅顺、张汝立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应通过提供附加性服务和提升能力机制来建立信任机制，从而获得社区居民的信任^[17]。林闽钢和战建华认为，“能促型”的发展路径是社区组织发展的最佳选择，通过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的转化，从而使社会组织的行动更有效和更灵活^[18]。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社区组织的治理作用也从最基本的生活服务衍生到社区文化建设、教育服务和解决突发公共事件等更多领域。如李敬、叶卓颖等认为基层社区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就其具体实施层面来提出如何解决社区组织协助义务法律适用困境的对策建议^[19]。

1.2.2 关于社区参与研究

1.2.2.1 社区参与的理论研究

20 世纪中叶,社区参与兴起,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开始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公民参与,强调公民参与对民主的影响^[20]。到 20 世纪末,帕特南等学者们开始对社区参与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他们认为群体之间的共同合作和互惠交往可以产生信任和规范,这将促进社区团结,并为群体带来更多的收益和福祉,并将这种网络资源定义为“社会资本”^[21]。奥尔森(Mancur Olson)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搭便车”理论,阐释了公众参与的动机是基于理性的计算与考量^[22]。即,个体可能会在大型群体中的共同行动中选择消极参与,以依赖他人的行动来获得利益。不过费奥里娜(Feuerstein)从集体理性的角度阐释社会参与不过是一种根本无法代表普通人利益与需求的精英参与而已^[23],隐晦的反驳了普通人的参与实质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随波逐流”。如今,社区参与在数字化背景下与多学科融合新兴研究。如历史和制度理论,该理论从社会历史和制度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个体参与社区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即,个体的社区参与行为不是单纯基于个体内在的动机或个人特征,而是受到社会历史和制度结构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社区参与的环境和条件,影响着个体对社区参与的态度和行为^[24]。

改革开放后,随着新政策的实施,中国学术界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展开了新一轮的思考,学者们开始系统引入西方社区参与理论,如社会资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等,初步应用于中国城市社区研究。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学者们开始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探索本土化的社区参与理论。大量实证研究涌现,关注居民参与的动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如今,社区参与研究逐渐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公共政策等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研究内容更加广泛,涉及到社区治理、社区教育、社会资本、志愿服务等多个方面。如社区参与理论,该理论着重于社区成员参与决策和行动的过程,认为积极的社区参与可以促进社区的发展和变革。如李小明和董坤认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可以加快地区产业升级转型和创造就业,为当地居民脱贫致富,对如何促进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参与提出了发展建议^[25]。社会资本理论,该理论主要关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对组织内外部活动的重要性。如,彭小兵,廖建娥认为,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而成的草根组织的参与,他们通常能够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联系和相互信任的关系网,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社区发展和社会合作的社会资本^[26]。

1.2.2.2 社区参与的经验研究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或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其自治

水平比较高，已是社会服务与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外居民个体或群体的社区参与通常采用以下三种方式。一是，社会服务团体。通过参与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或慈善机构等社会服务团体为社区提供服务。如加拿大的许多非商业性和非政府的志愿者服务组织和协会——加拿大红十字会、妇女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心理健康协会等等，旨在为社区、社会和公众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和支持。二是企业。通过企业对社区投资，不仅使慈善事业和商业事业得到平衡，还可以从社区参与中获得声誉等无形资产，塑造企业形象^[27]。三是志愿者。志愿者参与在西方国家相当普及，如德国从 19 世纪初开始，实施涵盖了各种领域，包括社区服务项目的“德国国民服务”制度，以鼓励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去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而当时社区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通过德国居民自愿进行的社会募捐。

由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我国的社区参与模式除了居民自发型的社区参与模式，无论是社区精英主导型、动员型还是互动合作型社区参与模式均离不了政府这只“有形的手”^[28]。因此，中国学者们对社区参与的研究方向都指向了居民的参与对象，即企业、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等，分别从利益驱动、认同驱动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去探索如何激发与推进居民等其他主体的社区参与。如潘泽泉认为，通过利益关联的理性选择、组织化行动和情感认同的情感投入可以推动与推进居民的社区参与，而利益分化、组织悬浮和认同缺失会阻碍居民的参与程度^[29]。王毅杰则认为企业基于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采取企业本身运营与成立社会组织的“双轨制战略”来进行社区参与的新模式。与企业本身而言，可以便于群众接受以此获利，还有助于与社区进行合作^[30]。

1.2.3 关于参与行为研究

1.2.3.1 参与行为的理论研究

由于国外对个体权利和自由高度重视，在社会规范与社会文化上强调个体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因此，国外学者在对个体参与行为的理论研究上更倾向于关注个体的自主选择和行为动机。行为的早期研究主要来自于心理学，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服从实验”认为，群体中的权威、群体压力、社会认同等因素会影响个体行为的决策和表现^[31]。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德尔·马库斯（Hazel Rose Markus）则从“文化心理”角度来强调文化背景对个体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塑造作用^[32]。在文化背景理论的基础上，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A·霍格（Michael A.Hogg）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常会倾向于参与和支持自己所认同的群体，并通过群体认同来塑造自己的行为 and 态度^[33]。20 世纪中叶，理性选择理论开始在社会学和政治学

治学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德国社会科学家欧凯伦（Karen D. Opp）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的参与行为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和最大化，个体通常会选择能够带来最大个人利益的行为^[34]。这一点在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得到进一步证实，即，当资源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和网络获取，个体便会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来建立和维持这些社会资本^[35]。以上理论常被用来解释个体在群体中以及各种情境中的行为模式和动机。

国内关于参与行为的研究在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才开始逐渐受到关注，中国学术界在引入和吸收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后，初步探讨了中国社会中的参与行为。20 世纪末，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们在引进国外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开始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本土化探索，尝试发展出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框架。为此，一些学者结合了国内历史背景和环境，认为中国城市居民个体参与行为发生是由于思维习惯而发生的社会行为（习惯领域理论）。如邓国胜、辛华指出，一些经历过“单位制”管理的居民们的“弱参与行为”的产生是由于过去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使他们缺乏参与意识与主人翁意识，而接受过新时代教育的青年人群的自治意识更强，参与意愿也日渐凸显^[36]。由于国外关于行为理论研究历程较长，国内学者们在对国外的一些理论吸收后进行了深化，为此，更强调理论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如目的理性理论、价值理性理论和情绪认知理论。目的性理论认为个体基于自身需求，为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利益或需求，以参与作为“条件”或“手段”，经过权衡后的理性考虑。如李杨指出，居民参与常常会受到经济性动机、利他性动机、社交动机、信息获取动机等众多动机性因素的驱动^[37]。价值理性理论强调行为是基于内在价值、信念和伦理标准的，而不是单纯追求外在利益和效果。如崔岩认为，个体的参与是由于他们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而非行为后果，凸显更多的是精神层面内容，包括熟人社区的邻里互助产生的满足感、情感共同体的构建等^[38]。情绪认知理论认为，个体参与行为发生是由于现时的刺激（情境或他人行为）而引起的社会行为。学者们对情绪认知理论甚至延伸到情绪调节、情绪智力、情绪社会化等新兴领域，拓展了研究的前沿和边界。如顾贺，孙兆倩分析了新冠疫情发生时，个体由于不断地评价环境中刺激事件与自身的关系而产生情绪的演变，进而引发行为的变化^[39]。

1.2.3.2 参与行为的经验研究

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国外对参与行为的理解与国内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梳理总结国外有关参与行为相关文献，以下四种情况更易促使参与行为的发生。一是文化传统。早在 18 世纪 30 年代，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就探讨了个体意识形态和社会交往对个体社会化过程的影响，强

调了社会文化和社会交往对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40]。二是在利益驱动的理性选择。贝克尔·加里（Becker,G.S.）指出，个体的参与行为是基于理性计算和利益追求的结果。个体会权衡参与行为的成本和收益，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利己主义的动机^[41]。三是制度环境。艾德温·A·洛克（Edwin A. Locke）认为，制度主要由政府构建，而政府的供给内容与供给效应在政府与居民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由于满意作为一种态度可以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对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性^[42]。所以政府行为态度和政策法规所营造的社区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市居民的参与行为。四是社会认同。乔兰达·杰特恩（Jolanda Jetten）认为，个体的参与行为是基于对社会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个体参与行为的动机来自于对群体利益和价值观念的认同，以及对群体成员的责任感和义务感^[43]。

国内对参与行为的理解则更多地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些都会通过影响个体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等影响个体对参与行为的态度、动机和方式。通过梳理总结国内有关参与行为相关文献，促使参与行为的发生主要存在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城市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在社区治理中，“人”的情感与主体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情感被认为是社区治理中不可忽视的维度，因此，文军和高艺多从微观去研究“人”与“情”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城市居民因为对社区组织管理的认同或在邻里交往间所发生的社区认同而更愿意去积极主动的维护社区环境和建设社区^[44]。二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孔娜娜和祝捷认为，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城市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和充足的信息，降低了其参与成本。如在线调查民意、鼓励民众表达意见和参与公共问题讨论等，这都会促进居民参与意识的觉醒，驱动其参与行为的发生^[45]。三是理性选择理论。居民参与行为的发生往往来自于自身利益或关联利益的动机，动机是激发城市居民积极参与和参与行为可持续性的核心因素，因此，梁贤艳和江立华根据动机分类方法，将动机按照一维或二维分类法去深入理解和分析城市居民参与动机因素，也有学者对依据社会结构变化，从清晰和模糊两方面去补充说明了居民参与行为发生的动机^[46]。四是社区环境。社区环境中塑造的规范、价值观念和期望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武照亮和靳敏指出，居民在未完全成长为独立的行为主体之前，对城市居民进行环境宣传教育并为其提供畅通的交流平台与参与渠道，有利于提高居民参与的主动性^[47]。

1.2.4 国内外研究评述

在关于社区组织的研究上，国外对社区组织的研究时间较长，其理论研究的框架也复杂多样，在研究内容上着重强调社区组织的形成发展以及其对社会和个

人的影响，以及其对社会变革、社区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国内关于社区组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社区组织的研究主要以其功能性研究为主，关注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注重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其实，国内外学者对社区组织的关注度都包括社区治理和社会服务两个方面。不过国内更强调社区组织是“一轴多元”治理结构中的“一元”。在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上，国内外对社区参与的理论研究存在明显差异，其差异点主要在于，国内关于社区参与的理论框架相对国外比较单一，其参与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强调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政府政策对社区参与的推动作用。在关于参与行为的研究上，国外关注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利益追求和理性选择，强调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性，并将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作为塑造个体行为的重要作用。而国内在借鉴了西方参与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还加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体主义等中国特色观念，更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以及居民对社区环境和情感认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们在对社区组织、社区参与和参与行为的既往研究中，既关注了居民在社区参与中的重要性，也关注了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优势，在探讨社区治理和如何发展社区组织中也提及了居民应组织化参与的建议。但是，既往研究均集中在如何基于需求提供平台，赋权赋能促进居民和社区组织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而对于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的定量研究却着墨甚少。而这，便是本文将要研究的问题。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以芜湖市居民为调查对象，对影响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行为的因素进行探索。根据研究结果，就如何提升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行为提供对策和建议。本文的研究技术路线图，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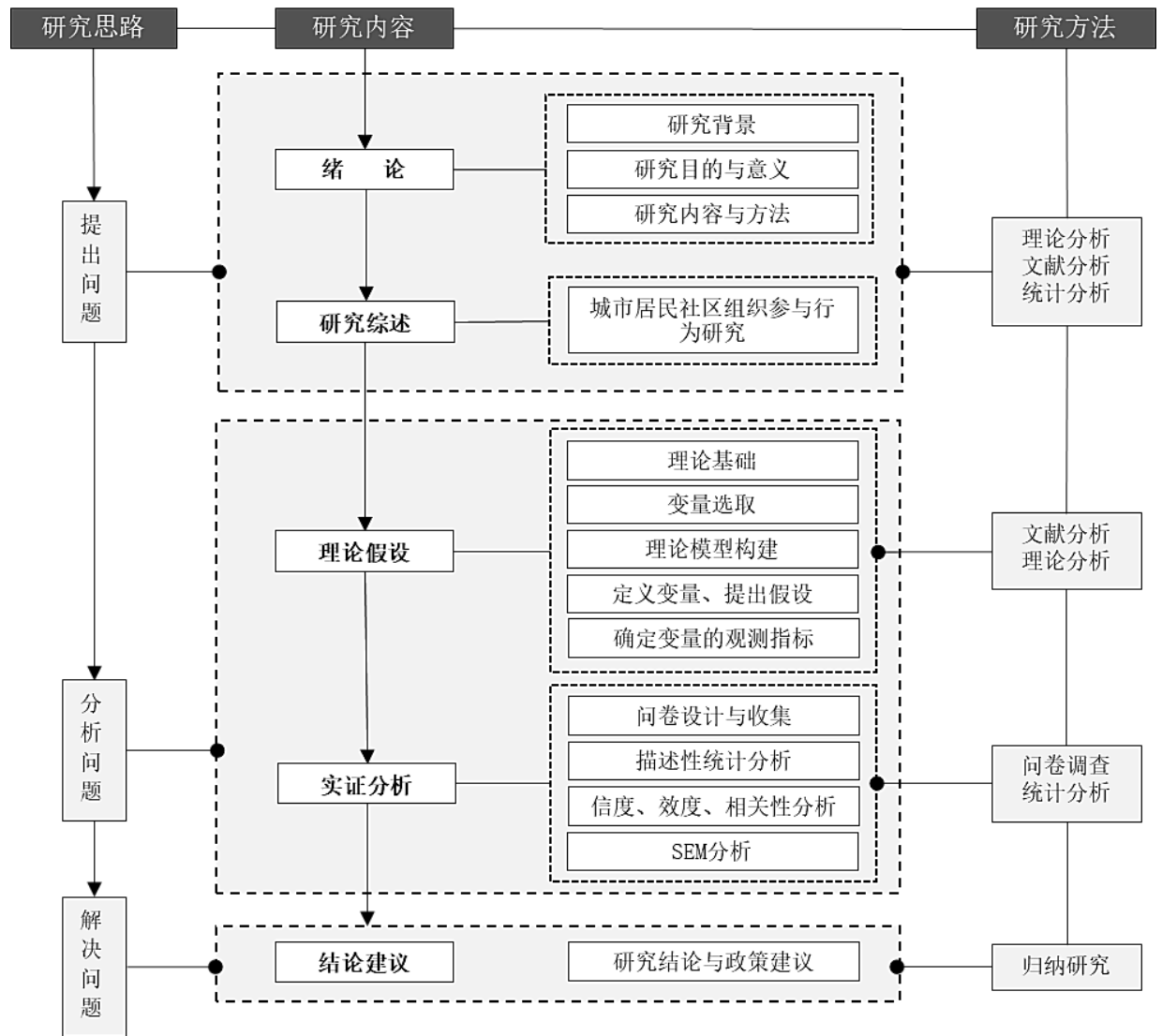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图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概况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背景，说明为什么要研究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概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再分别对目前国内外有关社区组织、社区参与和参与行为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分别评述以上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然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明确界定本研究中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和参与行为的相关概念和基本涵义。详细阐述本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研究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

第三部分，研究设计与实施。依据第二部分所提出的的理论基础提出本研究的相关假设，构建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因素的理论模型。设计调查问

卷题项，并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信度和效度等检验。

第四部分，模型检验与假设验证。运用 AMOS24.0 对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和假设验证，分析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依据研究结果作出相关评判。

第五部分，提出对策建议。根据研究结论和相关分析从居民、社区组织和政府三个层面就如何提升城市居民的社区组织参与行为提出对策建议。

1.3.2 研究方法

为探究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行为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利用国内外文献数据库对相关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相关研究问题进行检索，并通过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与综合，梳理与总结，以构建本文的理论研究框架。

（2）问卷调查法

参考通过文献研究所总结的理论依据，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获得影响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的态度、看法和感受等测量数据，从而得到有关本课题的真实而客观的研究数据。

（3）定量分析方法

基于既往研究和相关理论，构建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假设模型。由于本文假设存在多个潜变量，因此，为了更全面的从各种复杂的概念中提取影响路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对同时估计和解释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在分析多回归关系时具有灵活性、全面性和统计准确性的优势，因此是研究者们首选的分析工具之一。

第 2 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依据

2.1 相关概念

2.1.1 城市居民

“城市居民”这一名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当时提出“社会主义城市化”的目标并大力推行城市社区建设。为了管理社区事务，于是建立了社区居委会机构，居委会的工作职责就是管理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事务，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因此，“城市居民”这一名词最早用于指代在城市社区内居住、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居民。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加，城市居民所定义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包括社区内的流动人口、外来务工人员等。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与书籍，总结了城市居民的定义大约有以下四种：

(1) 在社区内居住，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2) 在城市社区内的公民、单位和其他组织。

(3) 在城市居住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包括集体宿舍、出租房、自建房等不同类型的居住人口。

(4) 在社区内长期或暂时居住的人员，他们的利益、需求和权益与社区的发展和社区管理密切相关^[48]。

以上定义在范围、侧重点和定义层次上皆有区别，由于本文研究更加关注城市居民与社区的利益、需求和权益的密切关系以及城市居民作为家庭、社区参与和治理服务的基本单位。因此，作者认为以上第四种定义更符合本文所述的城市居民概念。

2.1.2 社区组织

在中国，“社区组织”这个词语的由来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在这个时期，社会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开始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城市贫民窟的问题。他们认为，城市居民应该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共同解决社区内的问题，提高自我管理和自治能力，实现社会进步和改善。在这个背景下，“社区组织”这个概念开始被提出和广泛应用。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入和社区组织的不断发展，社区组织的概念和形式也

在不断演变和扩展。如今的社区组织不仅指社区基层政权组织，也包括在社区范围内为了社区发展和社区成员共同利益而有序形成的各类社会共同体，即，在社区范围内的所有为了社区成员共同目标而服务的各类组织^[49]。如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服务组织、非营利组织等。

依据不同的标准，社区组织有多种分类方法，从基本形态上对社区组织类型进行划分，社区组织可以分为社区政治组织、社区经济组织和社区中介组织^[50]。由于社区政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和社区经济组织对城市居民的协调和服务方式具有不同的能效，因此本文所述的社区组织不包括具有政治管理性质或受政治管理影响较大的广义的社区组织，如居民委员会、社区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等。故而，本文将社区组织定义为，以城市居民为主要成员，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可提供有偿服务的、以满足城市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城市居民自主成立或参加的社区组织。并且，按照是否盈利将社区组织区分为，社区非经营组织和社区经营组织。社区非经营组织包括社区志愿者组织和社区文化、娱乐、体育协会等。社区经营组织包括社区物业组织和社区自己兴办的各类企业组织。

2.1.3 参与行为

由于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因此，对参与行为的定义自然也具有不同的解释。美国管理学家维克多·弗鲁姆（Victor Vroom）将“参与行为”简单的界定为就是成员的加入，即个体在社区或者群体中的各种活动^[51]。而在政治领域上，“参与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社会、组织、或活动领域内积极参与的行为。这种行为可以表现为行动、决策、合作、贡献、互动或支持，通常有助于实现特定目标、满足特定需求、推动社会变革或共同价值^[52]。本文所指的参与行为并非是从公众参与理论（政治参与或公共事务参与等）来解释，而是按照个体自身具体的行为模式来解释。因此，本文所述的参与行为不仅指城市居民加入社区组织并成为其中的成员之一，也指城市居民以其他加入的参与行为，如城市居民参与了社区组织举办的某次活动或提供给社区组织某些物质或资源等。

2.2 理论依据

2.2.1 社会资本理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欧美国家的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社会学和政治学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此时，社会学家们试图探讨社会组织、社区关系和社会网络等社会现象对社会发展和个体行为的影响。如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Cooley）、艾米尔·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维伯

(Max Weber) 等人相继提出“社会团结”、“社会互助”和“社会关系网络”等概念,因此社会资本被定义为一种社会资源去试图说明社会组织、社区关系和社会网络对于个体和社会的重要作用。直到 20 世纪末,社会资本理论才逐渐成为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这其中以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等学者的贡献尤为突出。帕特南强调了社会资本对于民主制度、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量化测量方法^[53]。科尔曼则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社会资本对于组织效率、信息流通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又通过对教育领域的研究,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学生学习成就的影响^[54]。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和作用,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帕特南和科尔曼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社会资本的理論框架,还为其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指导。

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和指标有多种。国内外学者大多基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总量等指标来度量社会资本。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从参与度、信任度、联系度和归属感提出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55]。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虽然并没有像帕特南那样提出一个完整的量表或指标体系,但却基于社会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些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和指标,如社会网络密度、资源互惠、规范共识和信任^[56]。陈庆华、黄维通过问卷调查,分别从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网络和社区认同四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其中,社会信任是影响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57]。因此,社会资本可以增加居民之间的信任感和归属感,提高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信任度和认同感。在信任的基础上,居民更容易接受组织的目标和理念,并积极参与组织的活动和事务。

2.2.2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美国社会学研究。当时,一些社会学家在对个体行为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时,提出了“交换”这一概念,并认为社会关系中的交换是建立在互惠原则上的。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在他的经典著作《社会行为的要素》中提出了“成本与效益”原则,而他的《社会交换理论》则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交换理论的原理,即,个体参与社会行为时会考虑行为所需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效益,并据此做出决策^[58]。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了个体与组织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通过对资源、支持和回报的交换,形成了动态的社会交往。因此,在个体加入组织的过程中,组织需要提供足够的回报来吸引个体加入,并建立起合理的交换机制来维持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而满足个体对组织的期望和需求。

社会交换的测量方法和指标有多种。乔治·霍曼斯在其著作《社会行为的要素》中提出了一种用数学方式解释人际关系中的互动和决策的关键模型——交换方程式，这个模型分别从成本、效益、比率、期望以及替代选择五个要素中来研究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如何权衡成本和收益以决定是否参与特定的行为或交往^[59]。交换方程式对解释各种社会互动，包括个人间的友谊关系、商业交易和组织内的协作具有一定的帮助，因此，这个模型在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组织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成为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2.2.3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是 1985 年社会心理学家艾克·艾金（Icek Ajzen）提出的一种行为理论，旨在解释和预测个体在特定情境下采取行动的意图。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受到其行为意图的驱动。而行为意图则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这三个主要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也可以被影响和改变，从而影响个体的实际行为，该理论被证实是一种有效预测行为意图和行为的方法^[60]。

计划行为理论中有三个关键变量正向影响个体行为意向：（1）个体态度。指个体对于某种行为的主观评价，即个体认为某种行为是好的还是坏的。个体态度的形成受到个体对行为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2）主观规范。指个体对于自己周围重要的人对于某行为的期望，以及对于这些期望的重视程度。即，个体会考虑到他们周围重要的人（如家人、朋友、同事）对于该行为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否愿意遵从这些人的期望。（3）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体对于能够控制执行特定行为的程度的认知。这一因素涉及到个体对于执行该行为所需的能力、资源和障碍的认知，以及对于自己能够控制行为结果的信心。这三个关键变量互相作用，共同决定了个体对于某种行为的意向和最终行为^[61]。

计划行为理论通过解释个体的行为意向和行为模式，提供了一个理解个体行为决策和实际行动的框架。通过计划行为理论所提供的框架，其他研究者们可以更深入地探索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决策和实际行动。通过分析个体对于特定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行为意向的形成和行为模式的实施。这种理解有助于揭示个体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以及行为意向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也为研究者和决策者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可以帮助他们设计实验、调查问卷或干预措施，以验证理论模型的适用性，从而设计出有效的干预措施来促进积极的行为改变。因此，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环境保护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去解释个体的参与行为。如，个体的社区参与行为^[62]、慈善捐赠行为^[63]和环保行为^[64]等。

第3章 研究设计和实施

3.1 研究模型及假设

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是自愿的个体理性行为，因此，该行为的发生更多地依靠其自身的主观意愿。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解释，该行为意愿会受到个体对此行为的主观评价、个体周围对其重要的人对此行为看法的压力以及自我对此行为是否能执行认知的感知影响。因此，本课题认为计划行为理论对研究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三个关键指标中，行为态度是特定理性行为意向的先决条件，居民个体只有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抱有积极且认同的态度，才有可能主动参与。此外，居民个体是否参与社区组织的行为所受到其周围的重要人对此行为的看法和期望也会影响其参与意向。例如，当居民普遍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是一种值得赞扬和认可的行为，且社区组织的活动对社区发展和城市居民福利也具有益时，其个体进行社区组织参与的行为便会得到支持，相反则会受到反对。再有，居民个体对于自己能否进行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控制程度的感知，会通过影响其积极性和信心来影响其参与意向。所以，只有当城市居民具有参与社区组织行为的信心和克服此参与行为所可能发生的挑战和困难决心，社区组织参与行为才更有可能发生。因此，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设：

H1：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所持的态度正向影响其社区组织参与意向。

H2：城市居民所受到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其社区组织参与意向。

H3：城市居民的自我知觉行为控制正向影响其社区组织参与意向。

计划行为理论仅是一个解释个体行为决策和实际行动的框架，对于更好地区解释和理解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还应构建更多的关键变量。因此，依据已开展的文献分析和理论基础，本研究还将社会交换以及社会资本这两个因素作为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意向的另外两个重要潜变量。

社会交换测量的是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发生所需的成本和利益倾向，反映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动机中是否包含成本（例如时间、金钱、精力）或可能获得的利益（社会认可、满足感、学习机会等）。而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不仅会收到自身利益和期望的影响，同时也深受社会期望和群体认同的驱动过

程。社会交换的测量有助于解释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动机和可持续性。

社会资本测量的是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是否具有信任、参与和合作程度。社会资本资源可能被居民个体视为一种有助于控制和促进参与社区组织的因素，从而增强其知觉行为控制的感知，并对参与行为产生积极的态度。测量社会资本通常包括个体对社区组织的信任程度、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和方式，以及他们与他人合作的程度等方面。社会资本的测量有助于理解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动机和机制。

综上，本文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其他假设：

H4：社区组织所建立的社会交换机制正向影响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主观规范。

H5：社区组织所建立的社会交换机制正向影响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态度。

H6：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

H7：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态度。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因素的理论模型，见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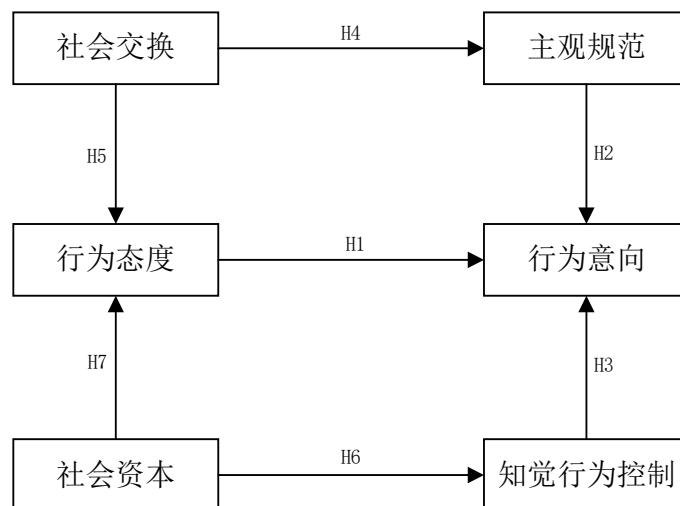


图 3-1 研究假设路径图

3.2 研究变量测量

3.2.1 计划行为理论维度

本文将社会心理学家艾克·艾金（Icek Ajzen）的三个关键指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作为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重要指标。

（1）参与意向

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意向是城市居民所持有的一种主观倾向，在本研究中“行为意向”被作为潜变量来预测城市居民参与行为的重要指标。因此，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参与意向变量的测量题项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变量“参与意向”的测量题项

变量	编码	测量题项	赋值
参与意向	INT1	我有意愿加入社区组织，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INT2	在时间和精力等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去参加社区组织举办的某些活动或项目	
	INT3	如果社区组织需要召集提供一些物质或资源支持，我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支持	
	INT4	对我来说，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各类活动将是一个有意义的经历	

（2）参与态度

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参与态度是指，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所持有的主观看法和个人评价。由于个体对某行为的态度与其行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参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对社区组织和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认知和价值的评判。基于以上分析，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态度这一变量的测量题项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变量“参与态度”的测量题项

变量	编码	测量题项	赋值
参与态度	ATTU1	我认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对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非常重要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ATTU2	我认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ATTU3	我认为居民应该积极参与社区组织，为社区建设出一份力	
	ATTU4	如果社区组织需要帮忙，我会主动提供帮助	

（3）主观规范

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理性行为，从社会心理

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框架下去理解，其参与行为的发生与否会受到外界对其行为态度的压力。即，如果城市居民感受到外界对其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态度越认可，那么其做出参与决策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基于以上分析，城市居民感受到的主观规范这一变量的测量题项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变量“主观规范”的测量题项

变量	编码	测量题项	赋值
主观规范	SubN1	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是一种受到赞扬和认可的行为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SubN2	朋友和或家人认为我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是正确的事情	
	SubN3	如果我身边的人邀请我一起参加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去解决一些社区问题，我认为我会去参加	
	SubN4	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活动对社区发展和居民福利有益，我应该参与其中	

(4) 知觉行为控制

城市居民个体对于自己能否进行社区组织参与的控制程度的感知，会通过影响其积极性和信心来影响其参与意向。因此，本文对该变量的测量关注在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内在自我效能的感知的评估。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这一变量测量题项如表 3-4 所示。

表 3-4 变量“知觉行为控制”的测量题项

变量	编码	测量题项	赋值
知觉行为控制	PBC1	我认为我能在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中发挥一定作用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PBC2	如果我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不影响个人工作与休息	
	PBC3	我认为我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不存在任何障碍	
	PBC4	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资源（如技能、知识等）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	

3.2.2 社会交换理论维度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离不开金钱、信息、情感等的交换，社会交换关系的维系依赖双方的投入和回报的平衡。因此，乔治·霍曼斯分别从成本、效益、比率、期望以及替代选择五个要素中来研究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如何权衡成本和收益以决定是否参与特定的行为或交往。在本文中，社会交换理论对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社区组织提供的资源丰

富、实用，且能够满足居民的需求，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反之参与意愿就会下降。社区组织能够及时给予居民回报，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么他们也会更可能发生参与行为。基于以上分析，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社会交换这一变量的测量题项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变量“社会交换”的测量题项

变量	编码	测量题项	赋值
社会交换	成本	COST1 我认为我有空闲时间去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COST2 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不会对我产生什么经济负担	
		COST3 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可以令我心情愉悦或有成就感	
	效益	BEN1 我通常因为参加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可以获得什么，否则我一般不会参与	
		BEN2 我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是因为它可以丰富我的生活、满足我的社交需求或帮助我解决一些问题	
		BEN3 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可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期望	EXP1 我在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前，通常希望可以从中获得什么	
		EXP2 我在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前，通常不希望承担成本或只承担比较低的成本	
	比率	RAT1 我认为我参加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的前提是我收获要比付出多	
替代		AltO1 我认为我个人遇到的麻烦或需求不用寻求社区组织帮助，因为我都能通过其他途径去解决	
		AltO2 我认为物业、街道、居委会或者政府有关部门等已经可以解决我遇到的麻烦或周边的公共问题了，不用寻求社区组织的协调和帮助	

3.2.3 社会资本理论维度

城市居民群体具有社会关系网络再造和社会资本积累的社会资本的特征，该特征会影响其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意向的形成。因此，基于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提出的社会资本指标，本文选取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信任资本、社区组织的网络资本和社区组织规范三个维度来测量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信任资本测量，反映的是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社区组织的网络资本测量，反映的是居民在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中，通过互动交流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对社区组织规范测量，反映的是城市居民与社区各组织基于共同精神和价值而形成的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规范准则。基于以上分析，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社会资本这一变量的测量题项如表 3-6 所示。

表 3-6 变量“社会资本”的测量题项

变量	编码	测量题项	赋值
社会资本	信任	TRU1 我相信社区组织可以解决社区内大多数问题	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 一般=3 同意=4 非常同意=5
		TRU2 我非常理解并支持社区组织所开展的各项活动与工作	
		TRU3 我相信社区治理有社区组织加入可以将社区建设的更好	
	网络	NWK1 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可以拓展我的人脉	
		NWK2 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能获取到一些有价值或有意义的信息	
		NWK3 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中发展来的社交关系对我的生活有积极的影响	
	规范	NRM1 社区组织内部完善的规章制度是促使我参与或坚持的条件之一	
		NRM2 社区组织成员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是促使我参与或坚持的条件之一	
		NRM3 社区组织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社区组织的相关规定是促使我参与或坚持的条件之一	

3.3 芜湖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现状

处于安徽省东南部的芜湖，是座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它横跨长江两岸，市区坐落在长江与青弋江交汇处的长江南岸，在古时，芜湖便是中江上的重要渡口，而从南宋起，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商埠，至 19 世纪末曾一度成为盛极一时的中国四大米市之首。如今的芜湖市不仅在经济上发展迅速，在基层社会治理上也坚持省级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作风，持续完善智慧社区建设工程，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并在构建社会组织发展新模式取得一定成效，具备较为丰富的社区组织管理案例。因此可以说，选择芜湖市作为本文的调研区域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65]。

2021 年 9 月，芜湖市民政局、中共芜湖市委政法委发布《芜湖市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旨在从培育发展、能力提升、作用发挥和规范管理四个方面开展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专项行动。计划至 2023 年，全市每个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10 个社区社会组织^[66]。目前，芜湖市城市社区共有 195 个^[67]，按照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计划，芜湖市城市社区组织应达到 1950 个。据调查显示目前全市已登记注册的社区社会组织有 206 余家，备案社区社会组织 1695 家，从业人员约 1.9 万人^[68]。虽然社区组织数量已基本达到计划指标，但根据芜湖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情况来推算，芜湖市 15~59 岁城市居民的社区组织参与情况大约为，每 171 人中仅有 1 人参与，参与度不足 2%。因此可以看出，社区组织数量的增加既不简单等同于居民参与数量的增加，更不等同于组织效能的增加。

根据本次调查问卷显示，虽然大部分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的社区的治理能力抱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在切实解决社区各种实际问题时却极少去选择寻求社区组织的帮助，甚至并不清楚。

3.4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3.4.1 问卷设计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研究认为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受到参与意愿的影响。但是参与意愿是不可观测的变量，为了使不可观测变量可观测和可操作，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对研究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其中，调查问卷中的题项可作为对不可观测变量的测量，因此量表的设计是整个研究的关键。

本文的调查问卷一共包含 36 个题目，分为两大部分：影响芜湖市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参与意愿因素和被调查者的个人特征。问卷的第一部分含 11 道人口统计变量题项，题项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问卷的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来对城市居民的主观意识强弱打分测量。即，受访者按“1~5”来对问卷的每个题项按自身的符合程度进行打分。“1”代表符合程度最低，受访者觉得题项越符合自身情况，打分越高，“5”为最高分。问卷测量数据的分析采用 SPSS25.0 和 AMOS24.0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为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在芜湖市城区中的五个区和两个经济开发区中各随机选择了一个小区进行问卷发放。通过预调研对问卷的测量题项做了些许的修改后，最终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

3.4.2 数据收集

本文的样本数据通过线上的调查问卷获取。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代表性，笔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即，从芜湖市城区中的五个区和两个经济开发区中各随机选择了一个小区进行问卷发放，再以每一户作为一个调研对象，由成年居民填写问卷。调查问卷共发放 300 份，收回 300 份问卷后，剔除了无效问卷 11 份。无效问卷包括以下情况：

- (1) 恶意作答。问卷所有题项答案重复率高于 90%的视为无效问卷；
- (2) 作答时间较短。经测试，完成本文卷时间大约需 2 分钟，因此作答低于 100 秒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
- (3) 因为线上问卷在设计时每个题项均已设置为必答项，因此该问卷不存在漏答和空白的情况。

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289 份。

3.5 问卷信效度检验

由于信度和效度作为评价问卷质量的重要指标会直接影响测量结果的可信度和准确性。因此，在进行测量模型检验之前，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3.5.1 信度分析

为了保证问卷中潜变量的测量信度，本文在问卷中均选择了两个以上的题项来测量潜变量。此外，为了保证问卷中项目通常属于同一个维度或者测量同一个概念，本研究对问卷进行了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克隆巴赫系数（Chronbach's α ）是用于评估测量工具内部一致性的一种统计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alpha = \frac{n}{n-1} \left(1 - \frac{\sum_{i=1}^n \sigma_i^2}{\sigma_X^2} \right)$$

其中， n 表示测量工具中的项目数； σ_i^2 表示第 i 个项目的方差， σ_X^2 表示测量工具总体得分的方差。在本文中，测量工具指调查问卷。

克隆巴赫系数值在 0 和 1 之间，该值越接近 1，意味着该量表信度越高。通常来说，当克隆巴赫系数大于 0.7 时，认为该量表具有与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运用软件 SPSS25.0 对本文的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后，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均大于 0.8，因此该问卷信度非常好，如下表 3-7。

表 3-7 各变量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参与意向	INT	0.941	4
参与态度	ATTU	0.941	4
主观规范	SubN	0.936	4
知觉行为控制	PBC	0.941	4
成本	COST	0.891	3
效益	BEN	0.878	3
期望	EXP	0.850	2
替代	AltO	0.865	2
信任	TRUE	0.895	3
网络	NWK	0.920	3
规范	NRM	0.899	3

3.5.2 效度分析

效度检验用于评估问卷是否能够准确地衡量所要测量的概念或属性。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构效度和准则效度等不同类型。内容效度检验可以通过专家评定、文献回顾、或者先前版本的问卷评估等方式进行。问卷中的测量题项主要通过文献回顾并做了适当的修改与调整，部分题项参考了具有代表性的成熟量表，因此可以认为本问卷具备较好的内容效度。

结构效度分为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在效度检验中，结构效度主要关注的是测量工具内部结构的准确性，即测量工具中各个项目是否按照理论构想的方式进行组织和分布。即测量工具内的各个项目是否能够被划分到正确的测量维度中，并且这些维度是否与所要测量的概念或属性相关联。

(1) 收敛效度检验

观察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是收敛效度检验中两个常用的指标。其检验的标准通常是，当 $CR > 0.7$ ， $AVE > 0.5$ 时，测量变量题项之间的一致性时可以接受的（Fornell&Larcker,1981）。本研究通过 Amos24.0 计算这两个指标的值，发现 CR 均大于 0.7，且 AVE 均大于 0.5（见表 3-8），这意味着调查问卷中潜在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较高，同时每个潜在因子的解释方差也较大，从而支持了测量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表明测量题项内部一致性较好。

表 3-8 收敛效度检验表

路径关系	标准化后的 因子载荷	S. E.	P	CR	AVE
SubN1 <---	0.893				
SubN2 <--- 主观	0.882	0.043	***	0.935	0.783
SubN3 <--- 规范	0.871	0.042	***		
SubN4 <---	0.894	0.042	***		
INT1 <---	0.892				
INT2 <--- 行为	0.898	0.043	***	0.941	0.798
INT3 <--- 意向	0.885	0.043	***		
INT4 <---	0.899	0.043	***		
PBC1 <---	0.893				
PBC2 <--- 知觉	0.906	0.042	***	0.941	0.800
PBC3 <--- 行为	0.893	0.042	***		
PBC4 <--- 控制	0.885	0.042	***		
COST1 <---	0.865				
COST2 <--- 成本	0.843	0.050	***	0.891	0.731
COST3 <---	0.856	0.052	***		
BEN1 <---	0.844				
BEN2 <--- 效益	0.837	0.056	***	0.879	0.707
BEN3 <---	0.841	0.055	***		

路径关系			标准化后的 因子载荷	S. E.	P	CR	AVE
EXP1	<---	期望	0.862	0.048	***	0.850	0.740
EXP2	<---		0.858				
AltO1	<---	替代	0.867	0.048	***	0.865	0.761
AltO2	<---		0.878				
TRU1	<---	信任	0.848	0.053	***	0.895	0.739
TRU2	<---		0.866				
TRU3	<---		0.865				
NWK1	<---	网络	0.880	0.044	***	0.920	0.793
NWK2	<---		0.896				
NWK3	<---		0.895				
NRM1	<---	规范	0.869	0.046	***	0.900	0.749
NRM2	<---		0.855				
NRM3	<---		0.873				
ATTU1	<---	行为 态度	0.891	0.043	***	0.941	0.800
ATTU2	<---		0.908				
ATTU3	<---		0.903				
ATTU4	<---		0.876				

(2) 区分效度检验

区分效度检验是一种用于评估测量工具是否能够有效区分不同概念或属性的能力的方法。它主要用于确定测量工具所测量的各个概念或属性之间是否存在足够的差异，以确保测量工具能够准确地区分它们。本文中采用比较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平方根与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大小的方法来评估测量工具中因子的“聚合性”。根据 Fornell&Larcker（1981）提出的标准，如果一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小于该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的平方根，那么可以认为该变量的区分效果良好。根据表 3-9 所示，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该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平方根（表格中加粗字体的数据）。因此，本问卷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3-9 区分效度检验

变量	社会交换	社会资本	行为意向
社会交换	0.855		
社会资本	0.329***	0.872	
行为意向	0.516***	0.483***	0.892

注：*表示<0.05，**表示<0.01

3.6 样本特征分析

为更全面地了解本研究所涉及的样本，从而更准确地解释研究结果并提高研究的可信度和适用性。本文对样本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如表 3-10 所示：

表 3-10 样本个体特征分布

个体特征	分类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43	49.5%
	女	146	50.5%
	总计	289	100.0%
年龄	20-29	107	37.0%
	30-39	67	23.2%
	40-49	57	19.7%
	50-59	37	12.8%
	60 岁及以上	21	7.3%
	总计	289	100.0%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5	1.7%
	高中及中专	78	27.0%
	大专	136	47.1%
	本科	70	24.2%
	本科及以上	0	0%
	总计	289	100.0%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27	9.3%
	共青团员	135	46.7%
	群众	127	43.9%
	总计	289	100.0%
居住时间	不足 6 个月	63	21.8%
	6 个月-3 年	57	19.7%
	3-5 年	58	20.1%
	5-7 年	45	15.6%
	7 年以上	66	22.8%
	总计	289	100.0%

个体特征	分类项目	人数	百分比
职业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人员	26	9.0%
	企业负责人或高管	33	11.4%
	专业技术人员	25	8.7%
	商业、服务业人员	25	8.7%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29	10.0%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21	7.3%
	军人	30	10.4%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40	13.8%
	待业	28	9.7%
	退休	32	11.1%
	总计	289	100.0%
收入	5000 元及以下	97	33.6%
	5001-10000 元	122	42.2%
	10001-15000 元	41	14.2%
	15001-20000 元	15	5.2%
	20001 元及以上	14	4.8%
	总计	289	100.0%

本研究参与者均是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自愿参与研究的，形成的调研有效样本共计 289 个，为确保调查的有效性以及不同年龄群体的代表性，本次调查涵盖了 20 岁以上的年龄，参与者主要年龄范围在 20 到 60 岁之间，其中男性占 49.5%，女性占 50.5%，教育水平有 70%以上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为保证抽样的随机性，参与者的选择均随机抽取芜湖市城区中的五区和两个经济开发区中的小区人员。因此，可以说本文问卷调查的抽样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

第 4 章 模型检验与假设验证

4.1 数据的描述分析

为了帮助研究者评估模型的适用性，以及是否需要对数据进行转换或采取其他方法来处理非正态分布的情况。所以在对模型进行验证和假设之前，评估样本数据是否符合单变量正态分布的标准是一个常见的数据分析步骤之一。通常情况下，如果样本数据的偏度的绝对值在 2 以内，峰度在 7 以内，认为数据分布形状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的。即，数据所描述的图形相对对称、尾部相对平缓^[69]。在实务中，对于正态性的判断，考虑到偏度和峰度的显著性检验受样本大小影响的问题，一些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偏度和峰度的具体数值来判断数据是否接近正态分布。尤其是在大样本情况下，更侧重于查看偏度和峰度的实际数值，而不是过于依赖显著性检验，这有助于降低因大样本而导致的显著性检验问题对正态性判断的影响^[70]。本研究运用 AMOS 24.0 软件对样本数据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问卷中的各个题项的峰度和偏度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2。在结构方程建模中，如果数据符合正态分布，这表明可以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来建模。详见表 4-1。

表 4-1 正态估计表

题项	范围统计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统计	标准错误	统计	标准错误
INT1	4	1	5	-0.057	0.143	-0.829	0.286
INT2	4	1	5	-0.183	0.143	-0.801	0.286
INT3	4	1	5	-0.152	0.143	-0.750	0.286
INT4	4	1	5	-0.165	0.143	-0.854	0.286
ATTU1	4	1	5	-0.044	0.143	-0.903	0.286
ATTU2	4	1	5	-0.105	0.143	-0.945	0.286
ATTU3	4	1	5	-0.187	0.143	-0.815	0.286
ATTU4	4	1	5	-0.088	0.143	-0.817	0.286
SubN1	4	1	5	-0.155	0.143	-0.835	0.286
SubN2	4	1	5	-0.113	0.143	-0.813	0.286
SubN3	4	1	5	-0.090	0.143	-0.757	0.286
SubN4	4	1	5	-0.225	0.143	-0.800	0.286
PBC1	4	1	5	-0.031	0.143	-0.898	0.286
PBC2	4	1	5	-0.098	0.143	-0.934	0.286
PBC3	4	1	5	-0.140	0.143	-0.909	0.286
PBC4	4	1	5	-0.135	0.143	-0.852	0.286

题项	范围统计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标准错误	统计	统计	标准错误
COST1	4	1	5	-0.179	0.143	-0.336	0.286
COST2	4	1	5	-0.026	0.143	-0.565	0.286
COST3	4	1	5	-0.084	0.143	-0.600	0.286
BEN1	4	1	5	-0.067	0.143	-0.584	0.286
BEN2	4	1	5	-0.175	0.143	-0.606	0.286
BEN3	4	1	5	-0.059	0.143	-0.705	0.286
EXP1	4	1	5	-0.004	0.143	-0.613	0.286
EXP2	4	1	5	0.014	0.143	-0.450	0.286
Alt01	4	1	5	-0.137	0.143	-0.684	0.286
Alt02	4	1	5	-0.165	0.143	-0.620	0.286
TRU1	4	1	5	-0.103	0.143	-0.710	0.286
TRU2	4	1	5	-0.212	0.143	-0.736	0.286
TRU3	4	1	5	-0.201	0.143	-0.563	0.286
NWK1	4	1	5	-0.146	0.143	-0.808	0.286
NWK2	4	1	5	-0.058	0.143	-0.734	0.286
NWK3	4	1	5	-0.090	0.143	-0.916	0.286
NRM1	4	1	5	-0.051	0.143	-0.875	0.286
NRM2	4	1	5	-0.230	0.143	-0.637	0.286
NRM3	4	1	5	-0.201	0.143	-0.696	0.286

4.2 实证分析过程

4.2.1 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SEM）作为一种验证性分析方法，在对所生成的结果进行分析之前，应先对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进行拟合优度检验的目的是评估模型在观测数据上的整体适应度，以确定模型是否能够恰当地反映数据的变异情况。拟合优度检验是 SEM 中非常重要的步骤，其目的和作用包括：1.评估整体模型适应度，使研究者可以了解模型是否能够很好地解释和预测观测数据的变异；2.检查模型中的假设，帮助研究者了解模型是否复合实际数据的特征；3.提高模型解释力；4.指导模型修正。

由于 Amos24.0 可以提供多种拟合指标来评价模型的拟合度。因此，本研究采用该软件去评判假设模型的适配度和可信度。常用的拟合度指标及其判断值如表 4-2:

表 4-2 结构方程拟合度的理想指标^[71]

指标名称	性质	范围	判断值	适用情形
CMIN/DF	考虑模型复杂度后的卡方值	-	1~5	不受模型复杂度影响
GFI	解释模型可以解释观察数据的比例	0~1	>0.80	说明模型解释能力
AGFI	考虑模型复杂度后的 GFI	0~1	>0.80	不受模型复杂度影响
IFI	比较假设模型与独立模型的卡方值	0~1	>0.80	比较不受样本大小影响
TLI	考虑模型负责后的 IFI	0~1	>0.80	不受模型复杂度影响
CFI	假设模型与独立模型的非中央性差异	0~1	>0.80	说明假设模型较虚无模型的改善程度
SRMR	标准化假设模型整体残差	0~1	越小越好, <0.08 可接受	了解残差特性
RMSEA	比较理论模型与饱和模型的差距	0~1	≤0.08 良好	了解残差特性

由于社会交换维度中的“比率”题项只有 1 个,不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要求,因此删除了该题项。通过 Amos24.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框架图,按照方程执行 SEM 分析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后,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4-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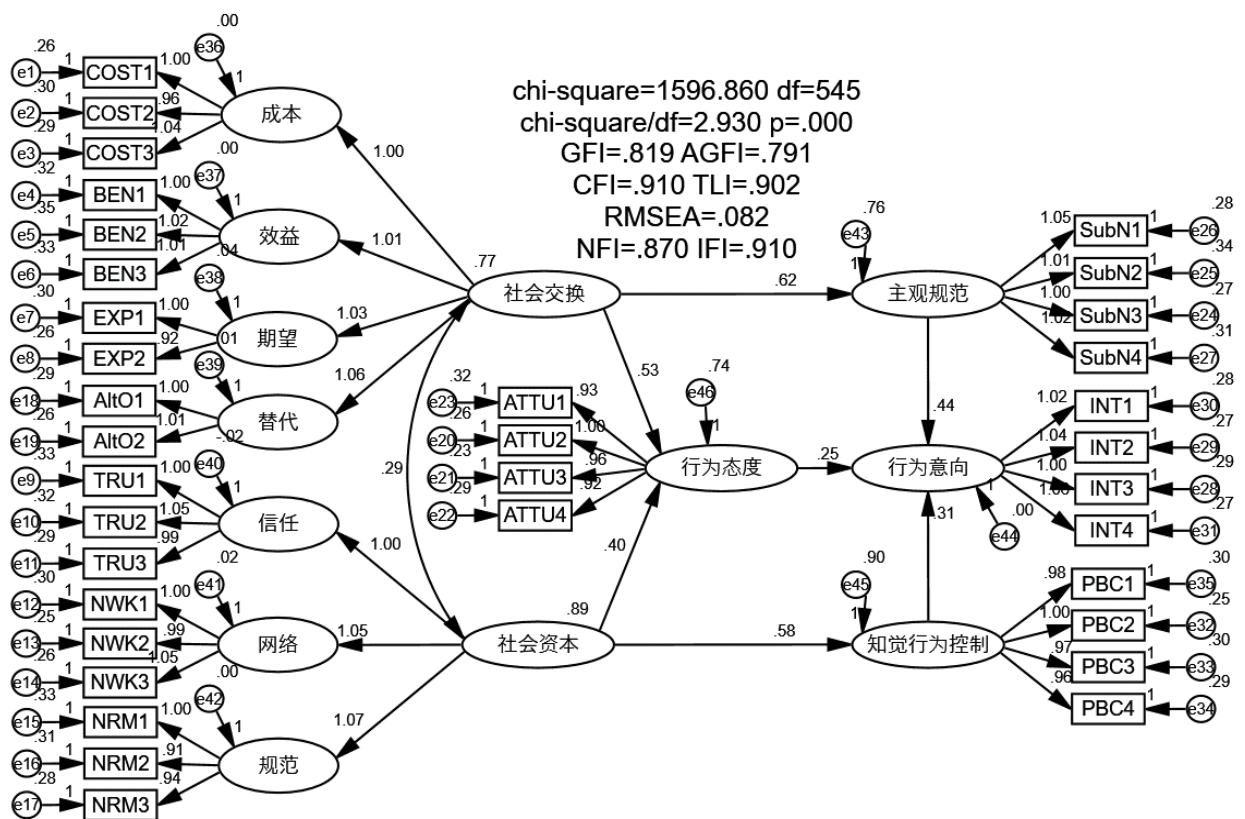


图 4-1 变量间关系模型图

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量表 CFA 模型适配度检验如下表 4-3。

表 4-3 拟合指标评价标准

指标	参考标准	实测结果
CMIN/DF	1-3 为优秀, 3-5 为良好	2.930
RMSEA	<0.05 为优秀, <0.08 为良好	0.082
IFI	>0.9 为优秀, >0.8 为良好	0.910
TLI	>0.9 为优秀, >0.8 为良好	0.902
CFI	>0.9 为优秀, >0.8 为良好	0.910
GFI	>0.9 为优秀, >0.8 为良好	0.819

根据表 4-3 的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显示, 假设模型的 CMIN/DF=2.930, 这说明估计协方差矩阵与样本协方差矩阵之间的差异较小。即, 模型与观察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RMSEA 为 0.082, 测量值处于 0.08 的临界值, 表示假设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一般。另外除了 GFI 的测量结果为 0.819, IFI、TLI、CFI 以及的检验结果均达到了 0.9 以上的优秀水平。因此, 综合本次的分析, 除了 RMSEA 和 GFI 的数值指标一般以外, 其他拟合指标均为优秀, 推测可能是本研究样本数据不够多的原因。因此, 可以认为在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量表模型中的 CFA 具有较为良好的适配度。

4.3 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假设验证

根据 AMOS24.0 对模型进行估计, 显著性分析如表 4-4 所示。

表 4-4 研究假设的验证结果

假设	影响路径	Std.	S. E.	C. R.	P	结论
H1	行为意向 <--- 行为态度	0.250	0.021	11.984	***	支持
H2	行为意向 <--- 主观规范	0.443	0.028	15.862	***	支持
H3	行为意向 <--- 知觉行为控制	0.305	0.022	13.978	***	支持
H4	主观规范 <--- 社会交换	0.618	0.068	9.119	***	支持
H5	行为态度 <--- 社会交换	0.533	0.070	7.615	***	支持
H6	知觉行为控制 <--- 社会资本	0.580	0.067	8.623	***	支持
H7	行为态度 <--- 社会资本	0.396	0.064	6.200	***	支持

注: ***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 4-4 可以看出, 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的 P 值在 0.001 上具有极高的显著性水平, 因此, 结构模型上的假设是成立的。

4.4 研究结果分析

4.4.1 整体框架路径分析

从表 4-4 的路径系数显著性可知, 本文提出的 7 个假设均得到了支持, 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对解释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行为的适用性得到了证实。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正向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意向, 其中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最为显著。而社会交换和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另外两个间接性关键特征, 分别通过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进而对城市居民社区组织的参与行为意向造成影响, 各因素之间的路径关系如图 4-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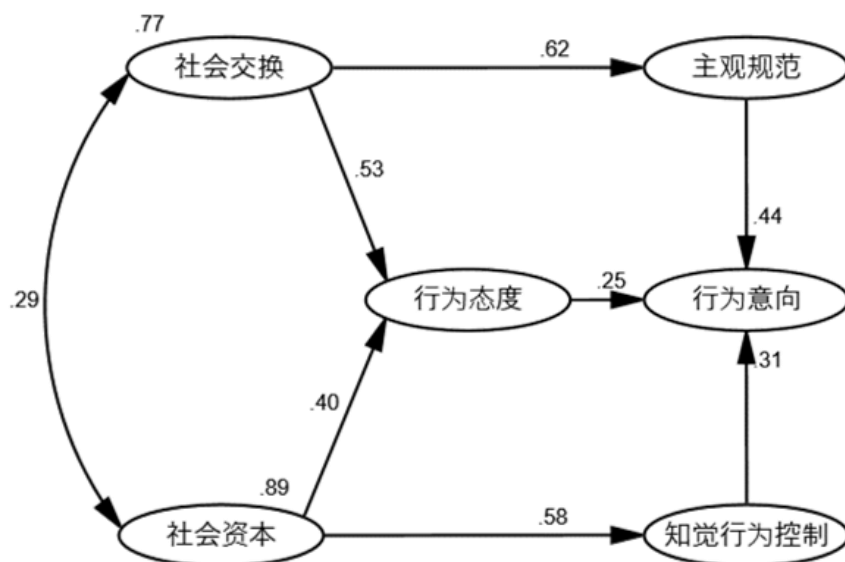


图 4-2 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意向影响路径

根据图 4-2 可知, 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态度、所受到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正向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意向。而社会资本和社会交换除了对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行为态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外, 还分别通过影响其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来影响其参与行为意向。

4.4.2 影响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行为的核心因素

从研究结果可知, 主观规范是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意向形成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因素, 它的影响路径关系系数为 0.44, 表示当城市居民主观规范每上升 1 个单位时, 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意向将上升 0.44 个单位。这意味着如果城市居民参与受到更多的鼓励与影响, 那么其参与社区组织的意愿也更强烈。主观规范与参与意愿之间的显著性可以从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框架下理解, 这种关联

可能反映了：（1）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组织时关注社区认同和社会期望的强烈需求。主观规范作为他人对参与行为的期望和态度的反映，强调了社区居民希望与社区内其他成员保持一致，并符合社会期望的倾向。（2）在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上，主观规范与参与意向的关联性强调了社会互动对于塑造个体参与决策的重要性。个体在考虑是否参与社区组织时，会倾向于受到他人的看法和期望的影响，这体现了社会因素在城市社区居民行为决策中的显著作用。（3）在对社区组织合法公平性认可上，这种关联性可能反映了城市社区居民认为社区组织制度是公平的合法的，那么自身对社区的贡献就是被社会认可和期望的。

总体而言，主观规范的影响表明社会和群体因素在塑造城市居民参与行为的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也为社会干预和社区建设提供了一些启示，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规范、社群认同和社会影响来促进积极的参与行为。通过了解社区居民对社区组织的期望，社区组织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和项目，以符合居民的期望和需求。这有助于建立更加符合居民意愿的社区组织架构，增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支持。此外，如果社区居民认为他们的参与符合社会期望且得到认可，他们将更有可能保持长期的参与动力，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4.4.3 社会交换与主观规范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表明，社会交换可以间接通过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的主观规范进而影响其参与意向，它的影响路径关系系数为 0.62。这种关联性反映了：（1）从社区参与动机的多样性来说，社会交换和主观规范较强的关联性反映了居民个体在参与社区组织时，既受到自身利益和期望的影响，同时也深受社会期望和群体认同的驱动的过程。（2）从社会支持与资源的交换方面来说，这种关联性暗示社区参与中存在一种社会支持与资源的交换机制。社会交换经验会增强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组织的认同和参与愿望，由于城市居民通过参与得到了社会支持、资源或其他回报，因此促进了其积极参与。（3）从社区组织的有效引导层面上，社区组织可以更有效地引导居民参与。如社区组织可以通过建立积极的社会交换机制和强化主观规范，以此激发更多的居民参与，从而提升社区组织的影响力和效果。此外，这种关联性还可能意味着社区建设和居民参与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交换和主观规范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社区居民可能更倾向于长期参与社区组织，因为他们能够在参与中获得社会认同和实质性的收益^[72]。

总体而言，对社会交换和主观规范关联性揭示了社区参与行为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理解居民参与决策的动机和因素，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了解社会交换和主观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从而能够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措施，以促进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为建设更加融洽和有活力的社区提供有益的理

论基础。

4.4.4 社会资本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可以间接通过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的知觉行为控制进而影响其参与意向，其影响路径关系系数为 0.58，这种关联性反映了：（1）社会资本在居民个体的知觉行为控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资本包括了居民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信任和互惠关系等。这些社会资本资源可能被居民个体视为一种有助于控制和促进参与社区组织的因素，从而增强了知觉行为控制的感知。（2）说明了社会资本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存在信任的交互作用。在社会资本丰富的环境中，城市居民可能更容易建立对社区组织的信任感，这可以进一步影响他们对自己能否控制参与行为的认知。（3）从促进社区组织参与渠道来看，这种关联性也可能意味着社会资本不仅影响居民个体对知觉行为控制的认知，而且为居民个体提供了参与社区组织的实际渠道。通过社会资本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居民个体可能更容易获取信息、资源和支持，从而降低了参与的实际障碍。并且，居民个体可能通过建立和维护社会资本，形成持久的社会网络和关系。

总体而言，社会资本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的关联性揭示了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复杂决策过程。这一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发生背后的动机和机制，而且为社区组织的发展、社区建设和社会资本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5章 提升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主要对策

5.1 巩固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的主体地位

5.1.1 提高居民参与意识

本文的研究表明，主观规范是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关系的总和^[73]。参与意识被视为参与者的责任感和权能意识^[74]。城市居民在实践中首先表现的是自身的自我意识，其次才是如何参与，最后对参与结果进行评价。

从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意识的非利益因素来说，社区组织参与能够使城市居民获得他人认同、是实现某种理想的机会。以此延伸来说，如果城市居民在社会组织参与行为中受到更多的鼓励和称赞，使其从心理上感受到愉悦和荣耀，那么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的意愿就会更强烈。而在结合本文的社会交换与主观规范、社会资本与知觉行为控制的关联性来看，这种鼓励和称赞就不能仅仅是给参与者发个证书或胸章等简单的，浮于形式的荣誉，还应加以实质性的形式来表达。如，参与志愿活动多少次以上且受到某些具体的事例表扬，不仅可以获得证书或胸章，还可以获得本社区某项特殊优待。反响较大，可作为典范广而宣传的事迹甚至可以获得区级或市级的一些政策优待等。当然，以上政策的制定需要社区组织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制定和打磨，以使制度更加详实和可操作性。另外，提高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意识必然离不开广泛的宣传。但是，社区组织除了对自身进行频繁的宣传外，同时还应补充和强调“他为什么要参与”和“他能获得什么”，帮助潜在参与者厘清参与原因和参与结果。原因有二，其一，目前依然有很多居民对社区组织是什么，能做什么和能帮助我什么等并不清楚，甚至完全不了解。其二，从本文中对社会交换与主观规范关联性研究结果来分析，当居民弥补参与意识和参与内驱力，使其了解参与后我能获得什么，并在内心作出比较和分析后所做的决策将更有可能持续参与行为，如此，宣传效果更佳。

5.1.2 完善社区组织制度

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只是参与行为发生的前置条件，居民持续的参与行为才能有效的为社区组织供能，使社区组织成为真正的社区治理的先锋。那么，如何使居民保持持续的参与热情？从本文中社会资本与知觉行为控制的关联性中，我

们可以找到一些解释。既然社会资本资源可能被居民个体视为一种有助于控制和促进社区组织参与的因素，那么从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信任以及两者之间互惠关系上来分析，其一，社区组织除了要增加多元化组织代表的参与，使其充分代表社区内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还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扩展更多渠道的参与方式和开放的参与平台，如社区服务 App、在线投票系统等，让每个居民都有机会以更便捷，更有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建议。其二，保持居民持续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是社区组织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运行机制。社区组织的制度必须始终围绕参与的平等性和公平性，以及制度可操作性上。社区组织在规章制度的制定上要与时俱进，时时根据政府政策和外部环境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与完善，以使其制度更符合实际情况，其服务更符合参与者的期望，从而赢得居民的信任。此外，社区组织对制度的遵守也不应完全流于“原则”或“原则上”，而应坚持两个“凡是”和两个“必须”。即，凡是对社区或居民有益的事，就应去做；凡是对社区或居民有害的事，就必须拒绝。必须保证组织内部信息和物资的透明度，必须对居民的需求和建议有正向的反馈。其三，社区组织要鼓励组织成员之间积极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可以通过组织议事或议会这种正式形式，还可以通过体育比赛、文艺娱乐或者沙龙活动等非正式形式来为组织成员提供经验分享、知识积累、情感交流和资源交换的平台。使组织成员与组织共同成长，增强其参与感、获得感、归属感和信任感。

5.2 社区组织各显其能激发居民参与

5.2.1 发挥物业组织环境脉络优势

在芜湖市城区,小区的物业服务覆盖率达 100%,业委会组建率达 99.2%^[75]。相较于其他社区组织,城市居民在实际生活中与物业组织接触较多,联系也较为紧密。虽然物业组织具有盈利性企业性质,但其在经营环境和服务对象上与一般企业具有很大的区别。其一,物业组织和其“衣食父母”——小区居民,地域相近,利益相连。其二,物业组织对小区居民不仅有服务义务,还常常伴有“邻里”的人文关怀。

目前,芜湖市物业组织在对小区的管理服务上主要施行的是网格化管理,即每个小区楼栋都配有楼管,楼管建立住户微信群并且添加住户个人微信或联系方式,以此与小区居民进行双向互动,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当前芜湖市一些街道和社区,如中南街道禹王宫社区^[76],社区党委对小区施行“点线面”结合的管理方式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镜湖区天门山街道党工委建立了各种“协同发力”

工作，来帮助物业组织提高服务能力^[77]。从服务的结果上来看，芜湖市物业组织在社区党委引领下，服务效果确实卓具成效，但在宣传上稍有欠缺，这主要是因为物业组织以服务为主导，没有尽可能发挥其环境脉络优势。

从本文研究结果可知，居民社区组织参与意识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因此，社区居民对社区组织的认知和态度以及社会对社区组织的支持都将成为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物业组织具备天然的“亲民”优势，其良好的服务可以影响居民对物业组织的态度，从而赢得居民的信任。在楼管定期与居民沟通、慰问，加强紧密联系的基础上，物业组织不仅要采用线下的各种方式对社区组织参与进行宣传，更要巧用小区微信群和朋友圈等加强线上模式的宣传力度。此外，社区党委可帮助并指导物业组织“敢问”、“擅问”去了解社区居民，以此获取和鼓励社区居民积极表达需求和意愿，并通过物业组织在小区微信群中传播，让小区微信群和朋友圈不仅成为物业组织和居民交流沟通的渠道，更是社区居民之间情感维系的平台。

5.2.2 发挥自组织的深度影响优势

社区自组织通常是社区内一些居民为了某一特定行动而自愿主动地结合在一起^[78]。城市居民除了与物业组织联系紧密以外，或多或少会基于自身的兴趣去参加一些文体娱乐类组织，当然，也有本着对社区的责任和共同利益而去参加一些社区志愿自组织。

在芜湖市城区，社区文娱类的自组织随处可见，这些自组织虽然规模较小，但自组织成员之间联系却非常频繁，交流也更加深入。社区自组织成员间频繁且良性的互动，可以使成员间以情感作为纽带而联系的更加紧密，而成员间的亲密关系也会吸引那些渴望再次建立社会关系的退休、待业或自由职业人员。首先，社区自组织经常开展活动不仅可以让组织内成员联系的更加紧密，同时也会吸引一些志趣相投，价值观相同的一类城市居民的认同与参与，而这种参与因具备情感基础而更具稳定性。如芜湖市经开区翡翠湾社区五彩志愿服务队 2015 年便成立，至今志愿者近 893 人，旨在为小区提供就业、健康、知识、维修和新时代思想理论宣传等方面的服务，开展至今受益人数多达 8000 余人，组织成员稳定增长^[79]。其实，社区自组织所开展的一些小型活动所需经费并不多，此外还可以通过自筹、宣传和与企业或政府合作等方式降低活动成本。其次，“社区自组织”中的自组织领袖和组织中受欢迎且热心的成员是邻里信息最准确和完整的“收集员”。社区自组织管理者在平等沟通的前提下，通过“收集员”收集的内部成员信息来充分发挥社区自组织对社区的管理、服务、文化和娱乐的作用。通过不断“收集”、“解决”社区居民的需求与意愿，社区自组织不仅对社区居民开展精准

服务，同时也扩大了自身影响力，使组织成员更有价值感，社区居民对组织也更加信任，因此，也更愿意去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

5.2.3 社区组织协力合作各显其能

目前芜湖市已有部分社区组织交互合作开展活动，如镜湖区荷塘社区恒爱行动大学生公益园项目自 2003 年实施以来，引导多所高校青年志愿服务队与社区团组织力量，近 500 名青年志愿者主动走进社区，长期开展爱心助学、扶老助残、家电维修、心理辅导等公益服务活动，为辖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低收入家庭子女等困难家庭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义务家教辅导。恒爱行动中每年固定服务志愿者不少于 50 人，辖区内近千名孩子受益^[80]。由此可见，多元主体合作不仅放大了各组织自身的特点，同时对社区的服务项目也更加多样，无疑增强了社会效应，当然，反之稍不注意也可能会增加负面效应。为此，社区组织在交换合作中应重视两点，一是，建立健全各组织成员的管理制度，这对提升社区组织凝聚力和确保组织运行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是各组织协力合作的基础。否则，组织成员之间可能会因为权利和利益的争夺而产生矛盾，使组织发展受阻。为此，要设立明确的成员加入和退出机制，采集参与成员完整信息，挖掘能人，为组织增能提效。其二，在合作前提前详细规划并明确各多元主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确保成员在参与活动中有序进行，是各组织协力合作顺利的保证。只有各组织成员清楚地知道在合作过程中自身的定位和职责，合作过程才能井然有序。行动中遇到矛盾时，各组织的管理者要及时对参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调解并进行反馈。其三，要多鼓励成员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对反馈信息进行收集、整理，认真分析反馈问题，及时调整和改进各组织的服务和管理方式。如此才能不断提升社区组织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使组织成员对组织运营具备期望和信心，促使其更加积极的参与组织活动，并且视社区组织参与为既有益于自身也有益于社区的事而感到有价值，甚至去鼓励身边的人去参与。

5.3 政府引导下的社区组织合作新格局

从计划行为理论上可以看出，参与意愿其实是参与行为的中介变量，政策和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也会通过影响参与意愿进而影响参与行为，因此参与行为其实是一种嵌入式行为^[81]。因此，政府的行为态度以及政策所营造的社区环境会影响城市居民的态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参与行为。所以，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的态度除了社区组织自身所展现的以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政府层面。政府不论对社区组织提供资源支持、政策扶持还是监督等方面，均有助于提升社

区组织的运作能力、服务水平、合法权威性以及治理能力等，进而影响城市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信任度。

5.3.1 帮助引导社区组织之间合作

芜湖市政府在“十四五”民政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引导社区组织在聚焦群众需求，扩大居民参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经营性社区组织还是非经营性社区组织，其最终目标都是要将居民个体利用各种关系来联结维系在区划之内，培育居民的公共意识。对于很多规模较小的社区组织而言，其拥有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有限，在运行的过程中很可能会面临资源分配不均衡、不足，在人员上面临能人欠缺，成员流动频繁的情况。资源的不均衡和不足会导致社区组织运行难以维系，人才的缺失会使社区组织更加缺乏专业性和规模效应。而人才的缺乏又使社区组织获取资源能力更加缺乏，资源稀缺更加严重，组织凝聚力更差，人才更加流失。如此恶性循环，社区组织不仅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难以生存。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协作治理不仅是芜湖市政府的指导要求，也是芜湖市居民的需求。因此，当社区组织在敏锐的捕捉到群众需求而无法及时满足时，政府如果仅一味地对社区组织进行物资方面的帮助，这一方面会加重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会剥夺社区组织成长的机会。政府在“给”和“助”之间要寻求一种平衡，找到两者之间的“边界点”。以“助”为主，以“给”为辅，充分发挥其中介作用，促成社区组织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协作，协助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帮助社区组织合力协作来完成项目。如此，社区组织之间通过项目合作和共同活动，增进了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与信任，从而可以建立起良好的社区关系网，这为促进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5.3.2 指导完善社区组织合作制度

虽然社区组织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使命，但并不意味着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不存在资源竞争、权力和荣誉的争夺。更不排除会有个别社区组织基于自身的利益去损害其他相互协作的社区组织利益。因此，完善合作制度和机制，规范社区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加强沟通协商、互信共赢是防止此类情况发生的关键。其次，可由政府部门、社区组织联合会等选择具有丰富经验和公信力的调解专家、社区领袖、行业专家等共同组建专门的利益调解机构和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社区组织间的利益纠纷和矛盾。建立明确的调解程序和规则，包括申诉受理、调查核实、调解协商和协议签署等环节。更重要的是社区组织间在进行项目合作前就应尽可能的将可预见的利益矛盾扼杀在摇篮中。所以，首先合作前就应制定详细的合作计划和实施安排，包括目标范围、责任分工、利益分配以及监督评估和奖罚等方

面的约定，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次，在合作过程中要注重沟通与协调，及时沟通合作进展并解决过程问题。当双方或多方在合作时遇到自身难以协调的利益冲突与纠纷时，可以申请利益调解机构或委员会评判。调解程序应公开透明，保障各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确保调解过程的公正和公开。完善的社区组织合作制度不仅可以提升社区组织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扩大其在社区内的认知度和地位，也可以促进组织成员对组织深度的制度认同。即社会资本中的组织成员的规范意识，可以使成员社区组织参与更加稳定和持续。

结论

城市居民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居民通过参与社区组织，可以更直接地参与社区事务，表达自己的需求与意见，从而为社区治理提供基础支持。城市居民参与社区组织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延伸，也是社区治理、社会和谐以及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率不足依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居民作为社区组织参与的主体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密不可分，城市居民通过参与社区组织可以培育其公共精神，而社区组织的发展壮大需要城市居民积极而广泛的参与。从研究路径来看，既往关于居民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基于需求和提供平台，赋权赋能促进居民或社区组织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发挥其社区治理的作用，或者在探讨社区治理或社区组织发展等相关研究中提及了居民组织化有序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建议与对策，而对影响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因素的定量研究却较为贫乏，还可深入挖掘。本文将城市居民与社区组织两者紧密联系，深入分析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发生的动机和影响因素，不仅深化了对社区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组织发展的理论认识，而且为相关学科的理论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以社区组织案例较为丰富的安徽省芜湖市作为实证调研地区，并假设了影响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影响因子、影响路径及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数据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理论模型的合理性。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居民、社区组织和政府三个层面提出了补充和建议，以此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的社区参与体系，推动城市社区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本研究虽然证实了影响城市居民参与行为主要因素的假设模型，但从影响城市居民参与意向因素的相关性系数来看，研究模型的构成因素还不够详尽，如，个人特征是否是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因素之一？此外，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因本人未能很好地把握研究进度，省略了对城市居民和社区组织的深度访问，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不够紧密。再有，城市居民参与的程度可以分为假参与、表面参与、高层次的表面参与和深度参与四种类型^[82]，本文也并未做区分。因此，在未来的研究学习中，对潜变量和可测变量的细化将作为本文的重要补充，也是本人后续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11/content_5624201.htm,2021-07-11.
- [2] 孙静琴.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促进策略:一个社会工作的视角[J].行政科学论坛,2022,9(07):50-53.
- [3] 张若寒.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再组织化研究[D].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22.
- [4] Perkins,D.D.,Florin,P.,Rich,R.C..Participation and the Social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Residential Blocks: Crime and Community Context[J].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90,18(1):83-115.
- [5] Woolcock, M.,Narayan,D.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Theory,Research, and Policy.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00,15(2):225-249.
- [6] Pfeffer J,Salancik G R.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M].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
- [7] 何欣峰.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4(12):68-70.
- [8] 刘伟红.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组织功能演化的行为策略分析——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6):132-140.
- [9] 李杰.顾客导向理念嵌入基层社区组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以上海市 S 社区为例[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72-81.
- [10] 徐富海.从汤恩比馆到赫尔大厦——社区睦邻运动发展过程及启示[J].中国民政,2016(14):57-58.
- [11] DeSensi,J.T.. Understanding Multiculturalism and Valuing Diversity: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Quest,1995:47,34-43.
- [12] Radel,Claudia.Women's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Conservation Projects,and Effective Land Control in Southern Mexico[J].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Geography,2005,4(2),7-34.
- [13] 王磊,周沛.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社会服务伙伴关系演化、本土化及治理之道[J].社会科学研究,2015(04):128-133.
- [14] 管兵.统合、嵌入、参与: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探讨[J].浙江学刊,2017(01):57-63.
- [15] 易艳阳.场域嵌入:助残社区组织发展路径探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56(03):71-79.
- [16] 章军杰.共同体视角下发达农村社区再造的路径选择——基于深圳 L 村社区的

- 调查[J].山东社会科学,2020(08):92-96.
- [17] 刘帅顺,张汝立.嵌入式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J].理论月刊,2020(5):122-131.
- [18] 林闽钢,战建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发展路径——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考察[J].治理研究,2018,34(01):58-64.
- [19] 李敬,叶卓颖,田翀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基层社区组织协助义务的法律问题研究[J].医学与社会,2022,35(01):129-134.
- [20] Almond,G. A., Verba,S..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 [21] Putnam,R.D..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M].Journal of Democracy,1995(6).
- [22] Verba, S.,Schlozman,K.L.,Brady,H.E..Voice and Equality: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 [23] Feuerstein, A. (2019). Rethinking Civic Participation: Elite Involvement and Collective Welfar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5(3), 321-335.
- [24] Marschall, M. J..Assessing the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 of America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4,57(4):545-555.
- [25] 李小民,董坤.以人民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参与意愿客源差异研究[J].泰山学院学报,2019,41(05):56-68.
- [26] 彭小兵,廖建娥.双重嵌入: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重庆市N社区的实践[J].社会工作,2021(01):77-89+109.
- [27] S.Brammer,A. Millington,The Effect of Stakeholder Preferences,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ndustry Type on Corporate Community Involvement[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45,No.3,2003:213-226.
- [28] 周良才.现代社区概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01:93-105.
- [29] 潘泽泉,欧阳小鹏.社区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参与层次及转换机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239(06):25-35.
- [30] 王毅杰,孙旌程.造血式扎根:企业社区参与的驱动因素与现实路径[J].学习与实践,2023(07):129-140.
- [31] Milgram,S..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J].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63,67(4):371-378.
- [32] Markus,H.R., Kitayama,S.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Emotion, and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1991 (2):224-253.
- [33] Hogg,M.A.,Terry,D.I..Social identity and self-categorization processes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1):121-140.
- [34] Opp,K.D..Rational Choice Theory.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M].Macmillan

- Reference USA.2001:1909-1920.
- [35] Putnam,R.D..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Simon and Schuster,2000:193-220.
- [36] 邓国胜,辛华,翟雁.中国青年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与动力机制研究[J].青年探索,2015(5): 31-38.
- [37] 李杨.城市老旧小区管理中居民参与激励机制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9.
- [38] 崔岩.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42(03):98-115+131-132.
- [39] 顾贺,孙兆倩.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影响机理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24):45-47.
- [40] Mead,G.H.Mind,self,and societ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115-135.
- [41] Becker,G.S..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70(5),9-49.
- [42] Locke,E.A..What is job satisfaction?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69(4).
- [43] Jetten,J.,Reicher,S.D.,Haslam, A.,Cruwys,T..Together Apart:The Psychology of COVID-19 (Special Issue)[J].Group Processes,Intergroup Relations,2020,23(6), 987-1192.
- [44] 文军,高艺多.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06):28-36
- [45] 孔娜娜,祝捷.互联网时代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价值、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J].行政科学论坛,2021,8(06):33-37.
- [46] 梁贤艳,江立华.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动机及激励研究——基于共建共治共享视角[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No.166(04):53-59.
- [47] 武照亮,靳敏.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基于“情境—过程—影响”的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1):55-66.
- [48] 王玲.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第三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25.
- [49] 张兴杰,叶涯剑.社区管理（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58-70.
- [50] 余冰.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的社会性与国家性[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25(06):88-93.
- [51] Jago, A. G.,Vroom, V. H.. Participation and Contingency Factors in Leadership Decision Making: A Model of Leader Effectiven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78:21(3), 464—472.
- [52] 周治滨.现代政治学引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04): 67
- [53] Putnam,R.D..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demo

- cacy,1995:65-78.
- [54] Coleman,J.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5-120.
- [55] Putnam,R.D..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Simon and Schuster,2000:193-220.
- [56] Coleman,J.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5-120.
- [57] 辛蕾,杨辰.社区社会资本的测度及空间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为例[J].城乡规划,2022(03):70-78.
- [58] Homans,G.C.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Revised,Expanded Edition[M].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56-60.
- [59] Homans,G.C.The Human Group.[M].New York: Harcourt, 1950:125-149.
- [60] Armitage,C.J., Conner,M.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A meta-analytic review[J],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1,40(4):471-499.
- [61] 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 2008 (2):315-320.
- [62] 张红,张再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天津市为例[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06):523-528.
- [63] 巫焕珍,罗晓艳,刘毅等.粤北地区医学生器官捐赠宣传教育效果分析[J].中国健康教育,2017,33(04):321-324.
- [64] 赵新民,姜蔚,程文明.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意愿研究:以新疆为例[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21,37(04):439-447.
- [65] 芜湖市人民政府.芜湖市“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EB/OL].<https://www.wuhu.gov.cn/openness/public/6596211/32911501.html>,2021-11-30.
- [66] 芜湖市民政局.关于印发《芜湖市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 [EB/OL]. <https://mzj.wuhu.gov.cn/openness/public/6596361/33921031.html>,2021-09-02.
- [67] 人民网.芜湖市 195 个城市社区打造“三公里”就业圈.[EB/OL].<http://ah.people.com.cn/n2/2022/0826/c375162-40097585.html>,2022-08-26.
- [68] 闫洁.安徽芜湖推动社会组织高质展. [EB/OL]. <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45955/content.html>,2022-09-20.
- [69] Curran,P.J.,West,S.G.,Finch,J.F. The robustness of test statistics to nonnormality and specification error in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J], Psychological Methods,1996(1): 16-29.
- [70] Leech,N.L.,Barrett,K.C.,Morgan,G.A. IBM SPSS for Intermediate Statistics[M]. Routledge.2014:150-175.
- [71] 张伟豪,郑时宜.与结构方程模型共舞-曙光初现[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

93.

- [72] Ajzen,I.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1,50(2):179-211.
- [7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 [74]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 [75] 芜湖新闻网.芜湖依法清退 11 家物业企业. [EB/OL].<https://www.wuhunews.cn/djzx/2024-02-01/438738.html>,2024-02-01.
- [76] 芜湖先锋网.弋江区中南街道禹王宫社区党委:党建引领物业管理“点线面”结合提质量.[EB/OL].<http://www.whxf.gov.cn/Home/Content/?Id=1216546>,2022-04-14.
- [77] 芜湖先锋网.芜湖市镜湖区天门山街道:“红色物业”让社区生活更美好. [EB/OL]. <https://www.ahxf.gov.cn/H5/Content/1077167>,2020-9-10.
- [78] 罗家德,梁肖月.社区营造的理论、流程与案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6.
- [79] 芜湖市经济开发区.[文明芜湖]最美志愿服务组织(团队):五彩志愿服务队. [EB/OL].<https://weda.wuhu.gov.cn/xwzx/ztzl/jswmjs/zyfw/18391360.html>,2023-08-22.
- [80] 芜湖文明网.镜湖区荷塘社区恒爱行动大学生公益园项目. [EB/OL].http://ahwh.wenming.cn/test/202310/t20231030_8307374.shtml.2023-10-30.
- [81] 王潇潇.职工文化卷入的影响因素及过程机理[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2.
- [82] 蔡定剑.欧洲的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3-15.

附录

附录 1 调查问卷

关于芜湖市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调查研究

尊敬的居民朋友：

您好！感谢您参与本次关于芜湖市城市居民社区组织参与行为的调查研究。请您坦诚、认真地填写本次调查问卷。您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区参与行为，并有可能为改进社区服务和支持提供宝贵的信息。

第一部分：个人基本信息（匿名且仅用于数据比较）

1. 性别：

☐男 ☐女

2. 年龄：

☐20~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59 岁 ☐60 岁及以上

3.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4.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群众 ☐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

5. 您目前所租住的房屋类型

☐商业住宅 ☐回迁房 ☐安居房 ☐已购公房 ☐单位宿舍

6. 商业住宅类型

☐普通住宅 ☐中等住宅 ☐高档住宅

7. 您在目前社区居住的时间：

☐不足 6 个月 ☐6 个月~3 年 ☐3~5 年 ☐5~7 年 ☐7 年及以上

8. 您目前的职业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人员 ☐企业负责人或高管

☐ 专业技术人员

☐ 商业、服务业人员

☐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 军人

☐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 待业

☐ 退休

10. 您的月平均收入

☐ 5000 元及以下 ☐ 5001~10000 元 ☐ 10001~15000 元 ☐ 15001~20000 元 ☐ 20001 元及以上

第二部分：各维度问卷量表

以下数字代表与您实际情况的相符程度，“1”代表相符程度最低，“5”代表最高，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您认为合适的程度，并在方框中打“√”。

计划行为理论量表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参与意向	1.我有意愿加入社区组织，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2.在时间和精力等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去参加社区组织举办的某些活动或项目					
	3.如果社区组织需要召集提供一些物质或资源支持，我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支持					
	4.对我来说，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各类活动将是一个有意义的经历					
参与态度	5.我认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对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非常重要					
	6.我认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7.我认为居民应该积极参与社区组织，为社区建设出一份力					
	8.如果社区组织需要帮忙，我会主动提供帮助					
主观规范	9.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是一种受到赞扬和认可的行为					
	10.朋友和或家人认为我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是正确的事					
	11.如果我身边的人邀请我一起参加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去解决一些社区问题，我认为我会去参加					
	12.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活动对社区发展和居民福利有益，我应该参与其中					
知觉行为控制	13.我认为我能在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中发挥一定作用					
	14.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不会影响我个人的工作与休息					
	15.我认为我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不存在任何障碍					
	16.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资源（如技能、知识等）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					

社会交换量表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成本	17.我认为我有空闲时间去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					
	18.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不会对我产生什么经济负担					
	19.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可以令我心情愉悦或有成就感					
效益	20.我通常因为参加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可以获得什么，否则我一般不会参与					
	21.我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是因为它可以丰富我的生活、满足我的社交需求或帮助我解决一些问题					
	22.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可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期望	23.我在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前，通常希望可以从中获得什么					
	24.我在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前，通常不希望承担成本或只承担比较低的成本					
比率	25.我认为我参加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的前提是我收获要比付出多					
替代选择	26.我认为我个人遇到的麻烦或需求不用寻求社区组织帮助，因为我都能通过其他途径去解决					
	27.我认为物业、街道、居委会或者政府有关部门等已经可以解决我遇到的麻烦或周边的公共问题了，不用寻求社区组织的协调和帮助					

社会资本量表		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信任	28.我相信社区组织可以解决社区内大多数问题					
	29.我非常理解并支持社区组织所开展的各项活动与工作					
	30.我相信社区治理有社区组织的加入可以将社区建设的更好					
网络	31.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可以拓展我的人脉					
	32.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能获取到一些有价值或有意义的信息					
	33.我认为参与社区组织或其举办的活动中发展来的社交关系对我的生活有积极的影响					
规范	34.社区组织内部完善的规章制度是促使我参与或坚持的条件之一					
	35.社区组织成员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是促使我参与或坚持的条件之一					
	36.社区组织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社区组织的相关规定是促使我参与或坚持的条件之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常勤珊,刘军.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增进新社会阶层社会信任的策略研究[J].铜陵学院学报,2022,21(06):62-66.

致谢

恍恍惚惚，半生浮；忽惊觉，已而立。于学之年，当勤学；然年少，总无畏。现总悔，愧对己。然，上有高堂，下有稚子，学虽奢，必尽能。幸得果，获良多。日当自勉不怠，以慰平生。

学业已近尾声，逝去总觉落寞。一来，毕业后，同学们为生活、为事业、为爱情而各奔东西，再相聚定是十分艰难。二来，原来清晰的小目标完成后，面对这再一次的启程，自己竟不知该何去何从。因为年龄价值的逝去，这处处透着不得已的未来，却又让我莫名的心安理得。人到中年后啊，总感觉有种无形的力量在推着自己的时间奔跑.....

回想起三年前，在得知自己考上研究生的那一刻之后，我就总在懊恼，这件事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去做？虽然我总回答别人，既已逝去，那便走好当下的每一步路。甚至有时候会在心底里埋怨父母，你们到底是怎么教育出我这个“怪胎”的？自以为是，却胆小怯弱。不过，至少我总能体会到这个小家的温暖，特别是我的母亲，唠叨的关怀已伴随我半生，每当听到她那没有逻辑的“胡言乱语”，总让我啼笑皆非又温暖似阳。

上有老，下有小，既是中年人的快乐，又是中年人的压力，为了生活和家人，中年人的学习时间所剩无几。幸运的是，有配偶的鼓励和父母的帮助，这双重的助力让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先生——汪步云，在我求学期间，不仅给予我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予我心灵和精神上的慰藉，让我一直在爱中徜徉。他，既是我的爱人，又是我的益友，更是打通我“任督二脉”对我人生影响巨大的良师^_^。

对我人生影响重大的第二位老师，便是我的导师——刘军老师。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研究生入学的那场复试.....感谢刘老师不厌其烦的引导并给予我学习的机会，在我读研期间，刘老师又总是尽心尽力的教导，最终使自己得以顺利毕业。也许这种跃然纸上感激总觉得寡淡了些，但是刘老师是位让我打心底里尊敬的好老师。

炎炎夏日，正如我此刻因激动而澎湃的内心....